

王韜與近代早期 香港華文報刊業

——《循環日報》創辦緣起考

蕭永宏

提 要

《循環日報》的成功創辦，與作為重要創辦人之一的王韜在《循環日報》創辦前比較深地介入香港華文報刊業密切相關。在此期間，王韜近代報刊輿論意識的形成，王韜與香港報界、商界和華人社會中知識人士的廣泛交往所建立的良好關係，王韜在《香港近事編錄》報館多年歷練所積累的豐富的辦報經驗和鑄就的鮮明的辦報風格，都不同程度地為《循環日報》的成功創辦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動力、人事財政保障以及相應的業務基礎。這些諸多條件的獲得和具備是促成《循環日報》成功創辦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王韜 《循環日報》 《遐邇貫珍》 《香港近事編錄》
《香港中外新報》 《香港華字日報》 陳善言 張宗良 馮普熙 梁安 陳桂士

《循環日報》何以能成功創辦？這是中國近代報史研究中不容回避的一個重要問題。以往的一些研究也曾涉及這一問

題，^[1]但或囿於第一手資料的缺乏、^[2]或過於注重從原則討論問題，^[3]使得該問題的研究略顯粗疏和浮泛。《循環日報》的成功創辦，主要應與作為該報重要創辦人之一的王韜早在該報創辦之前，比較深地介入諸多香港華文報刊密切相關。本文擬從《循環日報》創刊前王韜與香港各華文報刊的關係入手，追尋同一時期王韜近代報刊意識的形成、王韜在港期間的交往以及王韜新聞業務的積累等方面的蹤迹，以期實事求是地揭示《循環日報》的創辦緣起。

一、從《遐邇貫珍》到《香港華字日報》

(一) 王韜與《遐邇貫珍》

王韜為香港報刊撰稿始於 1854 年。時王韜仍在上海墨海書館佐西士麥都思、偉烈亞力、艾約瑟、慕維廉等譯書。這年 7 月和 8 月，香港的《遐邇貫珍》先後分兩期連載由王韜代筆但未署名的《瀛海筆記》和《瀛海再筆》。^[4]這也是目前所見王韜刊於近代報刊上的最早兩篇文章。

王韜《瀛壖日志》載有他為在滬期間結識的好友應雨耕代筆《瀛海筆記》一事：

七月初旬……是月中，應雨耕來，自言曾至英國覽海外諸勝。余即書其所道，作《瀛海筆記》一冊。^[5]

王韜的另一部著作《甕牖餘談》同樣提到此事。該書《星使往英》記云：

……咸豐初年，有燕人應雨耕從今駐京威公使往，在其國中閱歷殆遍。既歸，述其經歷。余為之作《瀛海筆記》，記載頗詳。^[6]

《遐邇貫珍》所刊《瀛海筆記》則交代該文來歷說：

癸丑六月，友人從英來，言客春偕居停主人回英，居其都者七閱月，目親身觀，凡英土民物之繁庶，建造之高宏，與夫政治之明良，制度之詳備，有可述者，皆筆而記之……^[7]

比照前述王韜《瀛孺日志》、《甕牖餘談》和此處《瀛海筆記》所記有關內容，即可發現，二者所記相關情況基本雷同。區別只是，前者明確提到被代筆者應雨耕的姓名，而後者隱之。

應雨耕是王韜在滬期間結識的好友之一。王韜《滬城見聞錄》咸豐三年六月有對應雨耕個人情況的介紹：

應雨耕，名龍田，直隸人，籍本浙江金華府，六月初旬從海外來，持其居停威君劄，謁見麥公，謂將入教，服膺耶穌。嗣是每日來讀聖書，正齋亦來合并。麥公為之講解，娓娓不倦。^[8]

王韜的這一記載為進一步確認《瀛海筆記》中隱去的被代筆人正是應雨耕提供了確鑿證據。首先：《瀛海筆記》所言的癸丑六月，即是咸豐三年六月，這與《滬城見聞錄》之時間記載完全一致。其中二者都提到的“直隸人”的身份也完全相同。而且，直隸人亦即燕人，這也完全雷同於王韜《甕牖餘談》的記載。其次，“從英來”、“偕居停主人回英”的提法也基本雷同於《滬城見聞錄》及《瀛孺日志》等著述中“從海外來”、“曾至英國覽海外諸勝”、“居停威君”等記載。而“居停威君”也就是英國駐京公使威妥瑪。況且，《瀛海筆記》中的“友”字，也說明了代筆人和被代筆人之間的關係。最後，《遐邇貫珍》所刊《瀛海筆記》的篇名和王韜多次在諸多記述中提到的為應氏代筆的文章名稱相同，均為《瀛海筆記》。綜合這些因素，不難確認，《遐邇貫珍》所刊《瀛海筆記》和《瀛海再筆》與王韜《甕牖餘談》等著述中一再提到的《瀛海筆記》應屬同一篇文章。

《遐邇貫珍》是由鴉片戰爭後由馬六甲遷至香港的英國倫

敦布道會下屬的馬禮遜教育會出版、香港英華書院印刷的一份中文刊物。也是香港最早出版的中文刊物和近代中國最早使用鉛印的中文報刊。1853年8月1日創刊,1856年5月停刊。^[9]前後共出刊33冊。^[10]由上海墨海書館的首任監督麥都思、麥都思的女婿奚禮爾以及香港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先後負責,實際事務由畢業於香港馬禮遜學堂、擔任倫敦傳道會教會印刷所主管的黃勝經理。^[11]

王韜在《遐邇貫珍》刊文疑與麥都思從中推薦有關。王韜自1849年備書墨海書館後,一直在麥都思手下從事中文翻譯的編校工作,主僕契合。王韜稱麥都思為其“海外一知己”。^[12]作為《遐邇貫珍》的主要創辦人和負責人,麥都思推薦王韜文章見刊該刊,當在情理之中。本來,應雨耕隨駐英公使威妥瑪赴英期間,對其游歷觀察所得,已有著錄,據王韜在《瀛海筆記》所言,應雨耕在英期間“據所見而錄之”,所有記述多達“數十則”。^[13]至於應雨耕從英歸來後該游英筆記又經王韜代筆,則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王、應二人交情篤厚,而應雨耕本人文化程度不高。王韜日記中多處記有王、應二人的交往,很多時候兩人幾無日不見。在一封致應雨耕的信中王韜還袒露心扉說:

瀚來海上,以文字交者,固不乏人;以意氣交者,閣下一人耳。^[14]

其實,王韜欽敬應雨耕的只是其“意氣”,而對其疏於文墨却不無怨言。如咸豐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日記》所記:

既夕,獨往應雨耕寓齋,數語即別。雨耕胸中固無隻字,性情乖謬異常,終日唯癩癖於烟雲中而已,何足與談!^[15]

應雨耕胸無點墨,又嗜烟如命,舞文弄墨,顯非其所長。因此,應氏游英筆記雖條目眾多,但在敘述的條理性和文氣的暢達等方

面應多有欠缺。在此前提下，借助王韜之力，由王韜“稍為修飾敘述”、“條次而錄存”，^[16]自可補此不足。另一方面，從王韜來說，自從“橐筆滬上”以後，留心西方的“象緯輿圖之學”，^[17]對西方的風土人情、歷史掌故及國人的海外見聞等留心搜訪，一直是王韜興致之所在。此番應雨耕歸國帶回的居英見聞錄，不僅可以豐富知識，開闊眼界，而且這些親歷記述還可以彌補《海國圖志》及《瀛寰志略》“二編之未備”，供“世之具三長而操著作權者之博采”，^[18]有益於世。因此，王韜非常樂意為應雨耕之游記代筆。

王韜雖然在《遐邇貫珍》創辦的第二年於該刊發表稿件，但王韜接觸《遐邇貫珍》應比這更早。因為主持墨海書館的傳教士麥都思是《遐邇貫珍》最早的創辦者和負責人。因此，墨海書館和《遐邇貫珍》必有較密切的聯係，王韜在備書西人之餘，較早閱讀《遐邇貫珍》應無疑義。譬如，1855年，與王韜同村、謀生於松江的孫惕庵曾致函王韜向他索要《遐邇貫珍》。^[19]另據《郭嵩燾日記》記載，1856年3月，郭嵩燾造訪墨海書館時，麥都思仍“外贈《遐邇貫珍》數部”於郭，^[20]而同一時期的趙烈文也將其收藏的全套《遐邇貫珍》借給鄧隨帆和吳嘉善等官方和知識界的朋友閱讀。^[21]這從側面也證明，比起郭嵩燾和趙烈文來，王韜在當時更有條件和機會較早接觸《遐邇貫珍》，同時還說明，在1850年代中期，至少在一小部分浸染西學的知識分子中間，《遐邇貫珍》已受到較多關注。

以往學術界提到王韜接觸近代報刊的經歷，一般只注意到王韜1857年9月刊於《六合叢談》中的《反用強說》以及在此前後刊於該刊的由他與傳教士偉烈亞力合譯的《重學淺說》、《華英通商事略》、《西國天學源流》等文。其實，早於此前，王韜已有文章在香港的《遐邇貫珍》刊出。這樣，王韜接觸近代報刊的經歷至少又可以提前整整三年。

(二) 王韜與《香港近事編錄》

王韜真正涉足近代香港報業是在 1862 年他避居香港之後。其中，結緣最深的當屬《香港近事編錄》。

《香港近事編錄》是 1860 年代中期左右誕生於香港的一份著名華文報刊，澳門土生葡萄牙人羅郎也創辦，^[22]每周三刊，逢星期一、三、五出版，^[23]1883 年停刊。^[24]關於其創辦時間，因原件佚失，無從查考。美國傳教士范約翰 1890 年 5 月提供的近代中文報刊目錄中，注明其創刊於 1864 年 5 月。^[25]

王韜介入《香港近事編錄》的具體時間亦不可考。不過，上海《益報》1875 年 10 月刊載的一篇評論文章中却稱，王韜 1862 年逃匿香港之後，“為香港日報館動筆之人”，^[26]經考證，此香港日報館即《香港近事編錄》報館。^[27]另據王韜 1867 年日記記述，

余居香港，倏忽六載。初尚事簡，既而筆墨之役蝟集，
卒卒鮮閑。兼以氣候炎暖，體中不愜，於是浩然思海外之
游。^[28]

所謂的“初事尚簡”，當指王韜佐理雅各譯中國儒學經典一事，而“既而筆墨之役蝟集”應與王韜在譯書之餘同黃勝合作編譯《火器說略》以及隨後兼職《香港近事編錄》報館，從事報紙稿件撰著有關，^[29]因此，很有可能，王韜 1867 年底隨理雅各赴英譯書之前，已經擔任了《香港近事編錄》的編撰工作。

王韜 1867 年底赴英後，仍同《香港近事編錄》保持關係，並為其撰稿。在英期間，他曾應《香港近事編錄》主編之邀，參加由該報發起的有關“中外強弱論”的微文討論，撰成《答〈強弱論〉》一文在《香港近事編錄》刊出。^[30]1870 年從英歸港後，他還同《香港近事編錄》的另一位主筆張宗良一起，譯撰成《普法戰記》一書，並將該書的部分書稿在《香港近事編錄》先行刊載。

不久，張宗良赴任港府華民政務司書吏，王韜也於 1874 年 2 月與陳善言等人一起創辦《循環日報》，並出任該報“正主筆”。《循環日報》創辦後王韜與《香港近事編錄》的具體情況不詳，但據目前所知，直到 1875 年 10 月，王韜仍有文章在《香港近事編錄》刊出。

王韜擔任《香港近事編錄》主筆期間，《申報》對王韜主持的《香港近事編錄》頗有贊辭。《申報》創刊伊始刊發的一則“本館自述”中稱頌王韜“留心世事”、“飛豪濡墨，揮洒淋漓”；^[31]另一則“本館自敘”中更誇贊《香港近事編錄》“采摭繁富，筆墨靈奇，早已增東壁之輝，作南針之指矣”！^[32]另據筆者核查，王韜在《香港近事編錄》撰著各類文章衆多，僅從搜集到的《上海新報》、《申報》、《益報》轉載的 165 篇文章來看，其中的絕大多數文章都出自王韜之筆。這些文章，有一般性的中外新聞報道，也有“論說”，還有少量類似後來“副刊”性的文字如詩歌、故事等。時間主要分布在 1870—1873 年間。其中，政論類文章多達 30 餘篇，另有 14 篇文章源於後來出版的《普法戰記》，還有個別文章後被王韜收入其《甕牖餘談》和《弢園文錄》等書。^[33]而且，不少文章從撰述風格和思想傾向來看，與後來王韜在《循環日報》刊發的文章已難分軒輊。

(三) 王韜與《香港中外新報》

《香港中外新報》是英國商人孖刺所辦香港西文報紙《孖刺報》(The Daily Press)的中文版，其前身是創辦於 1850 年代後期的《香港船頭貨價紙》。^[34]約 1860 年代初期更名《香港中外新報》。^[35]初為每周三刊，逢二、四、六出版，1873 年改為日報。^[36]

王韜與《香港中外新報》的具體關係不詳，目前所知者，主要有二。一是王韜赴英期間曾有文章在《香港中外新報》刊出。約 1869 年底左右，王韜就派遣中國幼童往英游學一事致函港中友人。信中提出，幼童留學海外，所習科目應以輿地、格致、技

藝、光學、重學、化學、律學、電氣學諸大端爲主，至於彈琴作畫之類則毋庸學習。後友人將此信刊於《香港中外新報》。這封信刊出後，有位署名“橫濱商人”的讀者又致函《香港中外新報》，對王韜信中的觀點予以商榷。^[37]二是1874年2月，王韜所著《言志》一文刊於《香港中外新報》。^[38]《言志》後經王韜改動先後再被收入其《弢園文錄》和《弢園文錄外編》中。

王韜在《香港中外新報》刊文表明，王韜和該報的華人主筆關係熟稔，且有一定聯繫。至於該報主筆係何人？尚待確認。^[39]

(四) 王韜與《中外新聞七日報》和 《香港華字日報》

《中外新聞七日報》是《香港華字日報》的前身，也是《香港華字日報》的“試刊版”，辛未年正月二十一日（1871年3月11日）創刊，壬申年二月二十九日（1872年4月6日）停刊，前後共出57期。^[40]1872年4月17日，在原“試刊版”的基礎上，《香港華字日報》脫離《德臣報》單獨出版。兩份報紙的創辦者和主持人均爲陳善言。^[41]

王韜與《中外新聞七日報》和《香港華字日報》聯繫較多，主要與王韜和陳善言私誼較篤有關。^[42]概括說來，主要有如下數端。一是王韜1870年由英歸港，與《香港近事編錄》主筆張宗良譯撰《普法戰紀》時，採擇了《中外新聞七日報》有關普法戰爭的報道。王韜事後述及《普法戰紀》各部分資料來源時說：

張君芝軒所譯於四卷以前特詳，以後采從日報者爲多，辛未正月陳君靄廷方有華字日報之役，與歐洲列國之事搜羅富有，幾於無美不備，此編十一、十二兩卷取資實宏。^[43]

此處的“辛未正月陳君靄廷方有華字日報之役”，即指辛未年正月二十一日問世的《中外新聞七日報》。^[44]二是王韜在港期間

與《中外新聞七日報》的主編陳善言合譯《聯邦名人錄》等海外著述，^[45]譯書中，陳善言還事先將二人所譯的該書列傳部分登載於《中外新聞七日報》。陳善言交代此事經過說：

吳郡王紫詮廣文具才學識三長者也，生平著作等身，而尤深於西學，能識其大者，於西國之輿圖掌故、國政民風，無不悉心考索，言之如數家珍，聽者爲之忘倦。余獲識廣文久矣，一夕剪燭傾談，言及聯邦人物，嘆華盛頓爲海外人傑，洵不可多得，余因舉《聯邦名人錄》一編出示廣文，廣文且曰：“當創國初，賢豪輩出，其爲華盛頓左右贊襄以建功名而垂竹帛者，尚有如許人，豈不盛哉！”廣文遂請余口譯而筆錄之。今先以列傳一篇登諸日報，庶幾見鳳一毛，窺豹一斑。^[46]

其後，《中外新聞七日報》連續分兩期刊載二人合譯的《聯邦名人錄》。三是王韜在《中外新聞七日報》發表了一些未署名的政論文章。其中能明確辨認的即有《開煤礦論》，^[47]另外，隨《開煤礦論》之後刊載的《金銀礦論》也疑爲王韜所作。^[48]除上述兩篇有標題的政論文章外，《中外新聞七日報》還刊載過少量未加標題的政論文章，其中，辛未年七月初四日所刊有關西班牙和葡萄牙歷史、地理的兩篇文章和壬申年二月二十九日所刊評論西人預測地球毀滅的一篇文章，^[49]很可能也出於王韜筆下。

王韜和《香港華字日報》的聯繫也有三端。一是王韜《普法戰紀》第十三、十四兩卷，其基本素材全部采自《香港華字日報》。^[50]不僅如此，王韜同張宗良譯撰《普法戰紀》時，還同陳善言合譯了美國人麥吉雅戈所撰《普法觀戰紀》。而且，據王韜交代，到《普法觀戰紀》十四卷本排印前夕，麥吉雅戈之書已譯成前兩卷。^[51]二是王韜的一些著作出版前在《香港華字日報》刊載過。較早刊載的是《瀛壖雜識》。據《申報》轉載的《香港華字日報》的文章，《香港華字日報》登載過《瀛壖雜識》中“志閨閣”

和“志方外”的有關章節，^[52]稍後轉載的是《普法戰紀》。同樣據《申報》所知，從1872年9月底開始，《香港華字日報》先後分21次連載《普法戰紀》，時間長達一年之久。^[53]三是王韜在《香港華字日報》也有文章刊出。核計《申報》轉載的文章可知，僅1873年至1874年年初，王韜在《香港華字日報》刊載的文章即多達5篇。這些文章，一部分後被收入《弢園文錄外編》，另有個別篇目後收入王韜的《弢園尺牘》，還有少數文章是由王韜《甕牖餘談》中的同名篇目略加改寫而成。有的文章，先在《香港華字日報》刊出，後又重刊於《循環日報》。^[54]值得一提的是，個別文章經《申報》轉載後還引發了《申報》的持續注意，並專門刊發相應的評論文章。^[55]

綜上所述，在《循環日報》創辦前的20年間，王韜幾乎和所有香港已經問世的華文報刊都有過各種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尤其是1862年王韜遁迹香港，隨後供職《香港近事編錄》報館後，他與香港華文報界的聯繫更加廣泛。這些聯繫，對王韜近代報刊意識的形成，辦報經驗的積累都有十分重要的積極影響。王韜隨後積極推動並參與創辦《循環日報》，便是以此為基本前提的。

二、從排拒西學到重視報刊輿論

王韜接觸近代報刊甚早，並且在《遐邇貫珍》、《六合叢談》等近代報刊上發表過少量文章，但是直到1862年遁迹香港之前，王韜的近代報刊意識卻相當淡薄。

兩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一是1855年，與王韜同村的秀才孫惕庵致函王韜向其索要《遐邇貫珍》，但王韜却在回信中一股腦兒將該刊及其“秉筆者”們貶斥一番：

承索《遐邇貫珍》，但此糊窗覆甌之物亦復何用？徒供噴飯耳！此邦人士，躐等而進，才知字義，已矜著述，秉筆者

半屬落魄商賈，鉅釘未學，欲求其通，是亦難矣！^[56]

王韜這番近乎痛罵的話，有對因生活所迫而“托迹休離，獲罪名教”^[57]的一腔憤懣和無奈，也有對《遐邇貫珍》的輕蔑和不屑。二是 1859 年 5 月，王韜及其好友蔣敦復與傳教士偉烈亞力就中西政治的優劣異同，有過一場討論。王韜和蔣敦復認為，西方政治大謬不然者有三：“男女并嗣”、“君民同治”和“政教一體”。偉烈亞力則以泰西政治“與民共治”和“與民共利”、“下悅而上行”等諸多優點為例，批評清廷“政事雍於上聞，國家有所興作，小民不得與知”等弊政，建議清廷“仿行新聞月報”。^[58]而王韜對此却百般辯解。他以“泰西列國，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為由，斷言刊行“新聞月報”之法在中國并不可行。^[59]

與上述兩例相映成趣，同一時期的王韜甚至還根本不把《六合叢談》認作近代報刊，而只把《六合叢談》視作傳統意義上的一般書籍。如《王韜日記》咸豐九年四月七日（1859 年 5 月 9 日）所記：

予謂近所著《六合叢談》中有《泰西通商事略》一卷，載其貿易粵東顛末甚詳……^[60]

又如以偉烈亞力名義發表的《六合叢談》創刊號《小引》中也說：

今予著《六合叢談》一書，亦欲通中外之情，載遠近之事，盡古今之變，見聞所逮，命筆志之，罔拘成例，務使蒼穹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遙，如同衽席……^[61]

這些表述，幾乎都在《六合叢談》前用了“著”字。固然，創辦《六合叢談》的偉烈亞力把本屬近代報刊的《六合叢談》當作中國傳統的書籍加以發行和宣傳，實有迎合中國傳統士人的習慣和爭取更多中國讀者的用心。但是，對於略知西學崖略的王韜來說，對此却未能明辨，反而將《六合叢談》以書籍相稱，這只能說明，有關“近代報刊”的理念，還遠未扎根於王韜的頭腦之中。

王韜近代報刊意識的淡薄,主要與1860年代初葉以前王韜鄙視西人西學的落後意識作祟有關。1850年代末期王韜所撰的《與周弢甫徵君書》,較為完整地體現了他這一時期排拒西學的思想狀態。

《與周弢甫徵君書》作於1857年,1859年後完稿。^[62]原為王韜向好友周騰虎系統陳述他對時局看法的一封信函。但是,信中通篇所表達的却是王韜對西人和西學的一再鄙夷和聲討。如文章開篇即開宗明義地宣稱:“西人之互市於中國”“即大害之所在”,^[63]“吾恐日復一日,華風將浸成夸俗,此實名教之大壞也”。^[64]文章還從“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的哲學高度立論,^[65]斷言泰西“器械造作之精,格致推測之妙”,在“我中國絕不能行”,^[66]同時對近代西方的天算、數學、動植物學等大加貶斥,認為根本不值得學習。此外,至於對“西人隆準而深目”、“性外剛狠而內陰鷙”的刻畫和揭露,^[67]視鐘表計時等近代科技為“奇技淫巧”,痛罵西人傳教為“播煽異端,滅裂正教”^[68]等的言詞也隨處可見。

王韜這封《與周弢甫徵君書》,後來在《弢園文錄》和《弢園尺牘》兩部著作中都先後被收錄,^[69]而且,收入兩書中的《與周弢甫徵君》的後半部分都提出了“仿行西法”的要求。“一曰火器用於戰”;“二曰輪船用於海,以備寇盜,戒不虞”;“三曰語言文字以通彼此之情”。^[70]王韜後來多次提及此函,並且常據此作為他最早倡導西學的依據,對其人為拔高。甚至為了標榜自己很早倡導西學,還不惜把該文的撰著時間提早到“咸豐初元”。^[71]但是,最早錄入《與周弢甫徵君書》的却是王韜的《蘅華館日記》,時間在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核對上海圖書館所藏稿本《蘅華館日記》,可發現,王韜《蘅華館日記》中錄入的《與周弢甫徵君書》中並無前述的“仿行西法三條”,而且《蘅華館日記》中也僅有十七行。^[72]這表明,截至1859年正月,有關仿行西法的三點主張還未寫入信中。同樣根據《蘅華館日記》稿本,與

後來收入《弢園文錄》和《弢園尺牘》中的《與周弢甫徵君書》加以比勘。即可發現，《蘅華館日記》原稿所錄該函中的“夷情”在後兩書的行文中全都被改作“西情”。^[73]而且，《弢園文錄》收入該文時，標題還被特意換成《與周弢甫徵君論西務書》。^[74]這也說明，突出“西務”、“西情”都是王韜後來所為。尤其是像用“西情”換“夷情”之舉，更能揭示王韜早年内心深處排斥西人西學的真實動機。^[75]

王韜對近代報刊的態度發生變化，是在他 1862 年遁迹香港之後。這同樣主要與王韜先前反對西學的態度發生轉變有關。這可從王韜 1864 年撰成的《代上蘇撫李宮保書》中得到證實。頗為偶合的是，王韜的《代上蘇撫李宮保書》是以《與周弢甫徵君書》為藍本加以調整修改而成。^[76]因此，比較兩文內容上出現的變化，很容易清晰地看到王韜思想上的轉變。

與《與周弢甫徵君書》相比，《代上蘇撫李宮保書》在內容上的變化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代上蘇撫李宮保書》中雖然繼續連篇累牘地沿用《與周弢甫徵君書》一文中有關“用夏變夷”的主要文字，^[77]但對以往這些觀點幾乎全部予以否定。如文中筆鋒一轉說：

不知如或之言，所謂主人枯槁、客自棄去之說也。如是則中國必先自受其弊，且勢必需之窮年必世，而非目前權宜補救之方也。^[78]

明顯對以前的陳說加以摒棄。二是在學習西學的內容和範圍上，《代上蘇撫李宮保書》也比《與周弢甫徵君書》有顯著擴大。例如，《與周弢甫徵君書》只提出了仿行西法三條，^[79]但《代上蘇撫李宮保書》中，在原先的三條之外還另加兩條，一是，“田器織具用於農婦”，^[80]一是“歷算格致用於取士”，^[81]而所加兩條恰恰是前一次“上書”中極力加以反對的。

當然，最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兩篇文章對時局和中西關係

的理解上。因為兩篇文章雖然都以“夫天下大利之所在，即大害之所在”開篇，^[82]統領全文，但《與周弢甫徵君書》一文認為，“西人之互市於中國”，誠天下之大害。^[83]而到了《代上蘇撫李宮保書》中，王韜却站在“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的高度，^[84]認為西人互市中國是“勢”所使然，倡言中國應放棄傳統的“攘夷”之策，積極尋求變通。再進一步看，《代上蘇撫李宮保書》一文中王韜已樹立了反求諸己、奮發有為，變害為利的思想。如王韜文中所言：

夫天下之為吾害者，何不可為吾利？……虞西人之為害，而遽作深閉固拒之計，是見噓而廢食也。故善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橫，而特患中國之自域。天之聚數十西國於一中國，非欲弱中國，正欲強中國，以磨礪我中國英雄智奇之士。^[85]

“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為”。^[86]而在此之前，王韜雖也不無有限的“仿行西法”之意，但其思想深處却抱有“靜聽其然，以待天心之厭亂”等消極等待意識。^[87]

不難看出，《與周弢甫徵君書》和《代上蘇撫李宮保書》實際上提供了王韜 1860 年代中期以前和以後兩個時期的兩種思想標本。而兩種思想標本的前後差異，鮮明的標示出王韜如何由強烈排拒西學、鍾情傳統名教，進而轉向學習西方，謀求中國振興的思想軌迹。

王韜對西學態度發生逆轉，與他對近代報刊的逐漸認同幾乎是一同起步的。從現在能夠掌握的材料來看，約於 1866 年，王韜在其行文中已經明確使用了“日報”的概念，而且此時的“日報”已被他看作了解中外時事的一面重要窗口。如撰寫於當年的《潮郡洋人入城事宜》一文中，王韜便提到：

聞堅領事亦以入城阻害始末奏聞其國君主，如何辦理已有成算，特其事甚密，外莫能知，且其梗概並不載諸日報，

莫由探悉。^[88]

這說明，對於日報的功用，王韜已經相當熟悉。

1867 年底，王韜遠赴英倫，開始他平生第一次海外之旅。兩年多的歐游經歷及其實地考察，進一步推動了王韜思想的變化。王韜的輿論意識也進一步成長。在英期間，王韜專程拜訪香港西文日報《德臣報》主筆德臣，贊揚德臣辦報“主持論斷，辨別是非，一准諸公，而絕不混淆於衆口”。^[89]言談之間，對德臣公正無私的輿論風格極爲敬仰。1870 年春，王韜從英國返港，此後便積極投身香港報界，以《香港近事編錄》爲舞臺，宣揚新知，鼓動改革。與此同時，他從了解“西國日報”開始，對近代報刊的“功用”有了一係列更爲理性的認識。

王韜首先對報刊“通外情於內”的作用極爲珍視，認爲“日報”是國人“留心西事”的津梁。早在 1864 年的《代上蘇撫李宮保書》中，王韜就對中國“二十年來，上下恬安，視若無事，動循古昔，不知變通”，於“西人之事毫不加意”，“受其所損，不能獲其所益”，“習其所短，不能師其所長”等弊端陋習提出尖銳批評。^[90]1870 年，王韜在《代上丁中丞書》中又以魏源當年撰著《海國圖志》時，“西事之書，無可采擷，甚至下及馬禮遜之《每月統紀傳》”爲例，批評“中土之弊，則在甘坐因循，罔知遠大，溺心章句，迂視經猷，第拘守於一隅，而不屑馳觀乎域外”。^[91]在王韜看來，“西國事迹之詳，莫詳於郵報”，^[92]因而，對其積極加以利用，完全可以改變上述國人昧於外事的種種弊端。1860—1870 年代之交，香港、上海等地一時報刊林立，王韜爲之歡欣鼓舞：

今日者，《遐邇貫珍》刊於香港，《六合叢談》刊於上海，《中外新報》刊於寧波，其他如《七日錄》、《近事編》，日報郵傳，更僕難悉。雖言非雅訓，而事堪考核。^[93]

他甚至準備以這些報刊資料爲素材，甄削鈎稽，“以一生精力，輯成《續海國圖志》一書”，^[94]以助國人開闊眼界，了解“世情”。

王韜對報刊在“達民情”、“通消息”方面的功用也有了更真切的體會。1870年,王韜在《上丁中丞書》中懇切指出:

西國政事上行而下達,朝令而夕頒,幾速如影響,而捷同桴鼓。所以然者,有日報爲之郵傳也。國政軍情,洪纖畢載,苟得而遍覽之,其情自可了如指掌。^[95]

王韜盛贊西國國政民情通暢自如的背後,蘊含著他對日報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疏通民情、聚合人氣、傳遞消息等重要作用的積極認同。在王韜看來,日報不僅是了解國政軍情的工具,而且是上情下達的橋梁。因此,對其不能不高度重視。

王韜不僅認爲報刊可以“通外情於內”,^[96]而且還認爲報刊同樣可“正內情於外”。^[97]鴉片戰爭後,隨着國門被打開,西文日報紛紛落腳國內。然而,出於殖民統治的需要,西方人所辦的這些外文報刊大都對中國抱有很深的成見,甚至不惜歪曲事實,惡意製造中外之間的對立。王韜揭露說:

顧同一西人日報也,在歐洲者其言公而直,在東土者其言私而曲,夫彼非甚愛我中國,以無成見也,此非甚仇我中國,以有先入之言爲之主,而輕蔑疑忌之心使然也。甚且交構其間,顛倒其是非,迷眩其耳目,簧鼓其心志,俾中外因是失歡。^[98]

權衡得失,王韜諫言丁日昌,希望清廷自辦西文日報,以“直書中外相涉之事,自我而達之於其國中”,^[99]以正視聽。

值得一提的是,王韜對報紙操持清議,影響政局的作用也有了清醒的認識。約於1873年年初,王韜撰著《英國新報之盛行》一文,詳細介紹英國《泰晤士日報》的編輯、發行等情況。文中,王韜用大量筆墨對該報總主筆低靈的日常活動、行事風格多有記述。他稱贊低靈“文字超卓不群”,“了於衆情,稔於輿論”,“於軍國大計昭然若指諸掌”。^[100]他尤其欽羨低靈報業生涯所

產生的巨大影響。

總主筆雖無職位於朝，而名貴一時，王公大人皆與之交歡恐後，常人之踵門求見者罕睹其面，是以人皆願為是館之總主筆，而不願為英國之宰臣。^[101]

從低靈在英國所獲得的隆名盛譽中，他進一步看到了報刊“繫於朝廷之清議，閭閻之公論，而得以陰持其政柄”的巨大威力。^[102]堅信“西國日報一端”，決不可“以小道視之”。^[103]他說：

宰臣之所操者，朝權也，而總主筆所持者，清議也。清議之足以維持國事，泰西諸國皆奉以為矜式，由是觀之，日報一道，安可忽乎哉？^[104]

王韜對近代報刊作用的上述認識和主張，實際上已觸及對作為一種傳播媒介的報刊的一些本質性的體認，體現出他對近代報刊輿論的高度重視。其中，值得充分注意的是，王韜始終注意到報刊在溝通朝野政治，國政民情方面的積極作用。王韜所一再強調的“日報一道”不可“忽”，不可“以小道視之”，多半都是以此立言的。因此，在王韜眼中，“日報”不僅有“道”，而且所載的還是“大道”。因為，中國要實現自強，根除長期以來“政事壅於上聞”、^[105]一般讀書人昧於“世情”等痼疾，“日報”將是一個有力而重要的工具。

王韜後來創辦《循環日報》實際上正是以上述認識為基礎。《循環日報》發刊時，王韜親擬《本局日報通啓》、《本館日報略論》、《西國日報之盛》、《日報有裨時政論》等文，^[106]集中闡述《循環日報》的創辦宗旨。在這些文章中，王韜除沿襲前述的一些主要觀點之外，還特別強調了創辦《循環日報》的政治用意。一是教化社會，懲惡揚善。王韜認為，報紙本身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而經常性的刊登一些來自民間的風聞逸事，即可以實現這一目的：

其出於風聞，得其大概者，不過借彼事端發揮胸臆，以明義理之不誣，報應之不爽，俾衆生感發善心，消除惡念，發幽光於潛德，開悔悟於愚民而已。^[107]

因此，對於一份報紙來說，重要的并不是它所刊載的這些“風聞”的真實性，而是它所具有的社會教育意義。總之，“一以隱惡揚善爲歸”，“俾觀者得以感發善心，懲戒逸志”。^[108]二是服務當道。王韜指出，建言當道是天下士子學人的應盡擔當，而辦報論政，刊載時事正是讀書人服務朝廷的一種有效途徑：

吾儒束髮受書時固早以致君澤民爲己任，乃既不獲如志，悠悠忽忽，以至日暮途窮而又瞻顧彷徨，使平生之見解，不得托諸空言，身似寒蟬，豈非真負天地生我、君師成我、父母育我之德乎？^[109]

可見，士人論政乃天經地義，而所謂的“好名之譏”、“位卑言高”、“妄談當局”等思想顧慮都只是迂腐之見。不僅如此，王韜還認爲，報紙刊載時事、評議時政這一做法與古代執政者的博采輿評頗爲相通。他說：

且日報之設，名雖未創，而實則相因。古者韜軒出使，采取風謠，謗木善旌，植之道左，亦所以周知民隱，此物此志也。況日報所登時事，無非獨抒管見，以備當事者采擇而已。^[110]

因此，報紙的“刊布馳行”，極“有裨時政”，^[111]對此，不值得大驚小怪，更不可無端非議。

相比於前述王韜對近代報刊諸多功能的闡發而言，《循環日報》創辦時，王韜更著意於揭示創辦該報的政治用意。表面來看，這一揭示只是他先前思想的自然延伸。但深入分析，就會發現，其背後所展現的却正是王韜渴望參與政治、并試圖以建言當道的方式服務朝廷這一中國傳統讀書人歷史使命感的某種自

覺。因而，無論是他所申述的“俾在上者知所維持，在下者知所懲創”的良苦用心，^[112]還是他所表達的“獨抒管見，以備當事者采擇”的積極追求，^[113]都無不表露出其內心深處心繫廟堂，眷懷家國的濃濃情懷。

王韜毫不掩飾他的功名意識和用世情懷，并多次宣示這是他創辦《循環日報》的主要動力：

韜雖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闕，每思熟刺外事，宣揚國威。日報立言，義切尊王，紀事載筆，情殷敵愾，強中以攘外，誨遠以師長，區區素志，如是而已。^[114]

又說：

韜雖才識庸下，智慮淺薄，學問簡陋，而未嘗一日無用世之志。淪廢遐裔，罔所舒展，抑鬱之懷，一發之於文字間，即至降而為日報，亦務在尊中而抑外。^[115]

顯然，早年科場的失利，其後的備書海上，甚至後來的遁迹香港，所有這一切都沒有泯滅王韜心中“致君澤民”的理想。報章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它的出現，為王韜一展其抱負提供了機遇。因為通過這種先進的傳播方式著書立說，既可以參與現實政治問題的討論，發揮自己所長，以自己的文章影響當道，又可以介紹新知，教化百姓，求民隱，達民情，起到溝通上下中外的橋梁作用。王韜從英國歸來後，以高昂的熱情投身香港報壇，進而創辦《循環日報》，其主要動力，正在於此。

三、王韜在港初期之交游和 報刊業務之歷練

王韜在介入香港報界的過程中，先後結識了一批當時活躍在香港報界、商界和華人社會中的知識人士。王韜同這部分人

士的交往,對推動和促成後來《循環日報》的創辦多有助益。同時,王韜創辦《循環日報》前,在《香港近事編錄》報館供職達數年之久,積累了豐富的辦報經驗,形成了鮮明的辦報風格,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對日後《循環日報》的創辦發揮了積極影響。

王韜在港初期所結識的知識人士大致可分成兩類,一類是黃勝、陳善言、張宗良等有一定西學背景和報業經歷的人士,一類是馮普熙、梁安、陳瑞南等買辦和商人。

黃勝是香港華文報界的元老。香港第一份華文報刊《香港中外新報》的問世,其首創之功甚偉。黃勝所長,主要有二:一是精通英語,二是印刷技術嫻熟,有長期從事印刷業的經歷。據史料記載,黃勝 1848 年從美國回國後,先在《德臣西報》學習印刷,後又長期供職英華書院印刷所,這一經歷前後長達十餘年之久,積累了豐富的出版、印刷經驗。^[116]黃勝與王韜相識較早,王韜在《火器說略》“前序”中說:

庚辛之間,江浙淪陷,余以避兵來粵……時西儒理君雅各方譯《尚書》,招佐編輯,因識黃君平甫。^[117]

但據《王韜日記》,兩人實際相識時間比這更早。《日記》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一日(1862 年 10 月 14 日)記云:

晴。黃勝兄來訪,能官白,曾於癸丑年至上海,携花旗公使往昆山,見江督怡良,所請未成。後因劉麗川之亂,旋返粵。^[118]

王韜八月十一日到港,黃勝來看他時他居港正好 10 天。從王韜《日記》的口氣和所述內容判斷,可能在 1853 年黃勝抵滬時二人已經相識。由於黃勝留學美國,通西語,加之被入李鴻章幕下的老同學黃寬推薦,遂為江蘇巡撫李鴻章看中。李鴻章托江南製造局總辦丁日昌,屢次致函黃勝,邀其北上協辦炮局。^[119]王韜得知有關情況後,遂建議黃勝貢其所知。後王韜和黃勝共同

合作，譯成《火器說略》一書，呈送李鴻章、丁日昌等當道。譯書過程中，王韜代黃勝先後多次修函李鴻章、丁日昌，陳述有關變革自強的諸種方略。藉此機會，王韜的才華為李鴻章、丁日昌所知，並受其推許。王韜更是由此結識丁日昌，視其為“生平第一知己”。^[120]據不完全統計，截至《循環日報》創辦前，王韜先後上書丁日昌的信函多達5封，^[121]其中代黃勝上書的即有3封。^[122]觀諸隨後王韜在《循環日報》撰著的一些有關變革的“論說”，其思想源頭大多源於這些早期“上書”。王韜和黃勝的交往，必須提到的，還有1871年王韜和黃勝等人出資購買英華書院印刷所的印刷器材一事。當年，英華書院及教會印刷所停辦，原屬教會印刷所的印刷器材除一部分被京師同文館購置外，其主體部分均被黃勝和王韜等人隨後集資承購。^[123]在此基礎上，成立香港“中華印務總局”，並決定日後創辦中文報刊。^[124]顯然，在中華印務總局成立過程中，黃勝所起的作用，別人無法取代。尤其是這批印刷器材的購置，是決定日後《循環日報》創辦的關鍵舉措，或許出於這樣的原因，《循環日報》創辦後，黃勝曾出任該報“總司理”。^[125]

王韜和黃勝的交往主要出於同齡人之間的私誼，黃勝早年的留美背景，熟稔西學，精通印刷，以及在香港報界和出版界的顯赫地位，都對王韜有一定的吸引力。而王韜傳統文化根底深厚，倡導西學，關心國事，思想見解卓爾不群等特徵同樣為黃勝所嘆服。這也是王、黃二人交往較深並在事業上相互倚重的主要原因。

王韜和陳善言、張宗良的交往稍異於黃勝。陳善言和張宗良為成長於香港華人社會中的知識精英。他們二人雖無留洋經歷，但早年均畢業於香港聖保羅書院，^[126]受過一定西學教育。又都先後擔任過港英政府書吏，出任過西人所辦報刊“主筆”。對香港華人社會和英國殖民機構的情況較為熟悉。如陳善言先充任香港巡禮府書吏，後出任《德臣報》“副主筆”。^[127]張宗良

先擔任《香港近事編錄》“主筆”，後赴任香港華民政務司書吏。^[128]另外，他們雖求學於英國殖民者所辦的教會學校，但早年都受過一定傳統儒學教育，因此都有程度不同的愛國心和實現民族振興的責任感。如張宗良著有《馭外芻言》，對鴉片戰爭、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外局勢的變動表現出深度關注。^[129]陳善言供職報界後不久，就對“香港於唐字日報獨為缺如”^[130]的現狀深懷不滿，遂先在《德臣西報》內附設《中外新聞七日報》中文專刊，後以此為基礎，辦成《香港華字日報》。陳氏辦報之初，一再強調“不圖弋利求豐”，“專求利益於唐人”，^[131]使中國士民於“中西情事”“悉知遍及”，^[132]達到“佐中治而稔外情”，^[133]“增益識見，擴新耳目”等目的，^[134]其渴望中國自強，捍衛華人利益的拳拳之心溢於言表，真實感人。

張宗良和陳善言不僅在思想上與王韜多有共鳴，而且在成就王韜的事業方面也不遺餘力，襄助有加。《普法戰紀》一書，就是在陳善言和張宗良的鼎力協助下得以問世的。^[135]而正是張宗良、陳善言在協助王韜譯撰《普法戰紀》的過程及其相互交往中，他們才對王韜邃於西學，才學識三長兼具等諸多優長有了深刻體認。王韜後來被香港中華印務總局諸同人一致推舉為《循環日報》“正主筆”，^[136]並隨後“總司厥事”，^[137]顯然與陳善言、張宗良等香港本地知識精英對王韜個人才具的極力推崇有很大關係。

王韜對陳善言和張宗良也頗有好感。1875年，王韜鄭重向丁日昌推薦陳、張和伍廷芳三人。認為三位皆為香港華人圈中之“佼佼者”，“能於西國語言文字而具有深識遠慮”。言張宗良“明於歐洲形勢，能見其大”。贊陳善言學“不名一家”，“律例有所深知”，“以華人而作西報，向所未有”，還把張宗良的著作《馭外芻言》“略加刪潤”，一同寄予丁日昌，供其“以備采擇”。^[138]陳善言後來出任清廷駐古巴薩馬丹總領事官，^[139]張宗良擔任駐日本使館翻譯，^[140]可能都與王韜的推薦不無關係。

相比而言，王韜和陳善言在辦報方面的相互倚重更多。陳善言創辦《中外新聞七日報》，王韜曾多次為其撰稿，後來《香港華字日報》創辦後，王韜在擔任《香港近事編錄》主筆的同時，仍一如既往地為其寫稿。不僅如此，為了支持該報的工作，王韜的一些著作如《瀛壖雜識》及譯撰之《普法戰紀》等都在該報部分刊載或連載，產生了較大影響。由於王韜和陳善言之間的相互支持，加之二人都有一定的辦報經歷，而且在決意創辦“華人操權”的華文報刊方面多有共識，因此，《循環日報》創辦時，陳善言出任該報“總司理”。^[141]

王韜除和陳善言、張宗良等知識人士多有交往之外，他還和當時活躍於香港華人界的一部分華商和買辦如馮普熙、梁安、陳桂士等人聯繫較多。這也是促成日後《循環日報》創辦的有利因素之一。

馮普熙為寓居香港的廣東東莞籍商人，香港有利銀行買辦。精通西學，關心時局，熱心華人公益事業。馮氏在港期間，與香港早期的著名華文報刊《香港中外新報》和《香港近事編錄》都有較多聯繫。他曾致函《香港中外新報》主筆，詢問泰西“製造銅帽之法”^[142]和“泰西製造急粉之法”，深獲《香港中外新報》主筆之贊許，稱其“今好學深思之士也，平日留心經濟，見製器格物有關實用者無不周諮博覽，以求其通”。^[143]馮普熙還參加了由《香港近事編錄》發起的“中外強弱論”的報刊徵文討論。所著《答中外強弱論》一文，主張“除弊”。^[144]在當時亦產生了一定影響。馮普熙與王韜在港期間交往頻繁，主要與二人思慮接近有關。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後，馮即與王韜商討事件起因及其應對方略。馮氏的有關見解深得王韜心許，王韜稱其為“今之深識遠慮之士”。^[145]王韜《普法戰紀》撰成後，馮也“大加嘆賞”，并同華商陳桂士等人一起在報端發布“徵刻”啓事，以“贊襄劂劂”，^[146]推動該書及早出版。《普法戰紀》出版前後，馮普熙還和伍廷芳一起，發起徵設“香海藏書樓”活動，^[147]此舉

同樣得到王韜的積極支持。王韜在其所撰《徵設香海藏書樓序》中欣然稱頌：“善矣哉！馮、伍二君之爲斯舉也。此向者所未有之於今日者也……蓋天欲特興文教於港中，故假手於諸君子以成之耳。”并預言此義舉將一改香港“儲積富饒，獨書籍闕如”，“文教未備”等窘況，“港中之媚學好奇者，識充聞博必迴越於疇昔”。^[148] 1873年，王韜及其他香港諸同人共同釀資籌辦“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并決定創辦《循環日報》。馮普熙先後擔任中華印務總局“值理人”和《循環日報》“值理”。^[149] 由此推斷，香港中華印務總局成立和《循環日報》創辦時，馮普熙都是主要股東和贊助人之一。顯然，馮普熙的“贊襄其間”，從財力上保證了“中華印務總局”和《循環日報》的創辦，爲王韜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保障。

梁安和陳桂士都爲香港著名華商。梁安，字鶴巢，廣東順德人。曾任香港和記洋行華人經理。陳桂士，字瑞南，廣東新會人。同馮普熙一樣，梁安和陳桂士也非常熱衷香港的公益事業，努力爲香港華商爭取權益。1869年，梁安“集衆籌謀，擴充舊址”，^[150] 與陳桂士一起發起設立香港東華醫院。1872年，王韜《普法戰紀》成書，陳桂士同馮普熙一起在報端發起“徵刻”活動。《普法戰紀》付梓時，王韜還請陳桂士爲該書作序。^[151] 王韜對梁、陳等人創辦東華醫院的義舉也鼎力相助，王韜擔任《香港近事編錄》主筆期間，對東華醫院的情況多有報道。^[152] 1872年東華醫院落成，王韜還應梁安之請，欣然撰序，志其創建始末，^[153] 并另撰楹聯兩幅，以示祝賀。^[154] 王韜與梁安、陳桂士等人之間的相互支持一直延續到《循環日報》的創辦。1873年，中華印務總局成立，梁安、陳桂士均以股東身份贊襄其間，一同出任該局“值理人”，^[155] 1874年2月，《循環日報》創辦，梁、陳二人又同時擔任該報“值理”。

王韜本爲一清廷查拿的逃犯，流寓香港之初，落寞寡歡，處事低調。不意到了1860年代中後期，却時來運轉，聲名遠播。

一時間，在王韜周圍，不僅集結了一部分像陳善言、張宗良等的知識精英，而且聚合了像馮普熙、梁安、陳桂士等的香港華人界的頭面人物。王韜頗受他們的推崇和擁戴。其中的主要原因，除了王韜富有忠君愛國之心、飽讀詩書、學識深湛、精通洋務西學等個人魅力外，還與王韜在港期間敢於捍衛華人利益，在制止和聲討販賣華人為奴等事務上與上述人士密切配合、積極行動有關。香港割讓以後，販賣華工前往美洲充當苦力的“豬仔”貿易日行猖獗，屢禁不止。這些活動大都以葡萄牙殖民者管制下的澳門為據點，嚴重傷害了中國人的利益。王韜自1870年從英國歸來後，便積極投入到揭露和制止澳門非法販賣苦力的活動中。“數年間”，他“或延律師以與之辨析，或糾同志捐資代贖，或反復呈請於英官秉公釋放”，“雖赴湯蹈火、傾篋傾囊亦所不辭，務欲其出諸水火而登諸衽席而後已”，^[156]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揭露和制止非法販賣華人為奴一事被同樣熱衷華人事務的馮普熙、梁安、陳桂士等人所關注和支持。如壬申年四月初五日，陳桂士和黃勝同往香港金寶銀行拜見赫德。拜會中，“陳君（指陳桂士）毅然論及放買豬仔一事深為中國之害，請公（指赫德）轉奏朝廷，中外協力刪除此弊，以重民命，即以所編《豬仔之弊款》呈公，公欣然納”。^[157]同一時期《香港中外新報》刊出的香港華商答謝英國律師為華人洗冤的“頌詞”中，也常有梁安和陳桂士的署名。^[158]至於馮普熙，更是日後以“防範誘拐，保障婦孺”^[159]為宗旨的香港保良局的發起人和主辦者之一。^[160]這表明，王韜所從事的活動一定得到了馮、梁、陳等“同志”的支持，並贏得了他們的信任和敬仰。除此之外，1870年初期，王韜還在報端發表了不少關於開礦築路，興利除弊等主張的政論文章，其中大都反映了這部分華商的願望和要求。王韜在港期間的這些活動和作為，拉近了他和香港華人社會的距離，也為他進一步融入香港華人社會奠定了基礎。因此，不僅王韜希望有華人自己做主的報刊問世，而且香港的華人社會也企盼能有捍衛

自己權益的輿論代言人出現。在此前提下,當王韜、黃勝等人於1873年發起創辦香港“中華印務總局”,並決定創辦華文報刊時,當然會受到馮普熙、梁安、陳桂士這些華商領袖的積極支持。他們中的一些人如馮普熙、梁安等樂於充任“中華印務總局”和《循環日報》的股東,從財力上踴躍支持獨立的華文出版和報業事宜,這些行動正是他們這一願望和要求的充分表達。

王韜在《循環日報》創辦前,已在《香港近事編錄》報館擔任編輯和主筆多年。流寓香港期間,王韜與香港其它華文報紙《香港中外新報》、《香港中外新聞七日報》和《香港華字日報》等也聯繫頗多,其中,由陳善言負責先後籌辦的《中外新聞七日報》和《香港華字日報》,王韜很可能還兼任過一定的編輯事務。^[161]因此,對於報紙編輯的具體業務,王韜相當熟稔。尤其是在《香港近事編錄》報館的多年歷練,鑄就了王韜鮮明的辦報風格,這些風格幾乎都在後來的《循環日報》得到顯現,並加以發揚光大。

從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來看,王韜主持《香港近事編錄》筆政期間的辦報風格主要有三。一是重視報刊言論。報刊之有論說,并不自《香港近事編錄》始,^[162]但是在重視報刊言論方面,《香港近事編錄》的確走在了同一時期其它華文報刊的前面。據筆者對1869—1872年間《上海新報》轉載的《香港近事編錄》和《香港中外新報》的文章比較分析,發現無論是論說文章的數目還是具體內容,《香港近事編錄》都比《香港中外新報》要更為突出。^[163]尤其是在論說文章的內容上,《香港近事編錄》具有明顯的優勢。這些文章幾乎都涉及有關國計民生和國際時事的一些重要問題,有較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感。二是濃鬱的世界意識。關注國際時事,重視對國際時事的譯介、報道和評論是《香港近事編錄》的另一特徵。《香港近事編錄》不僅注重對世界各國歷史、文化、科技、風俗等相關知識的一般介紹,而且還注重對國際時事的評論。更難能可貴的是,該報刊發的一些國際時評中,已

經展露出自覺運用國際眼光觀察和分析問題的痕迹，并能據此提出相應對策。譬如，《香港近事編錄》所刊發的一系列由王韜撰著的對普法戰爭的評論即是如此。評論中，王韜已能相當嫻熟地從“歐亞一體”的視角立論，深入考察普法戰爭對世界形勢和中國局勢產生的深遠影響，并據此呼籲中國“變法自強”。^[164]三是較強的民族性格。《香港近事編錄》是一份由澳門土生葡萄牙人所辦的華文報刊，由於“行主西人”，“秉筆雖華人而立言者固西人”。^[165]因此，在一定的情況下，或在一些涉及西洋人根本利益的問題上，該報發表一些維護歐洲人利益的觀點和“論說”自無可厚非。^[166]然而，筆者所搜集到的各報轉載《香港近事編錄》的百餘篇該報文章中，還未見一篇類似文章。相反，抨擊西方殖民者販人為奴及從事鴉片貿易，尖銳批評傳教士所辦的《中西聞見錄》中有關文章言論的悖謬，^[167]指斥西方人斷然否認作為中華民族祖先的龍的存在過於自信等的文章却不在少數。^[168]同樣，較早在該報發起有關“中外強弱論”的討論和報紙徵文活動，努力為1860年代初興起的自強運動推波助瀾、倡導保護華商和海外傭工的華民、褒揚兩廣總督瑞麟治粵政績和用人方略、^[169]為清廷重臣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時的過失辯誣^[170]的文章也頻頻刊出。凡此表明，作為一份澳門土生葡萄牙人所辦而由王韜編輯的華文報刊，《香港近事編錄》在輿論風格和思想傾向方面，的確注意捍衛中國人的利益，其措辭立意，并未像其它外人所辦的華文報刊那樣，唯西人馬首是瞻。因而，《香港近事編錄》有較強的民族性格，這無可置疑。

王韜擔任《香港近事編錄》主筆期間所體現的上述辦報風格，後來問世的《循環日報》幾乎都有繼承和發展。《循環日報》注重刊發“論說”、積極關注中外時局的變化，尤其是偏重議論國際時事以及主張“華人操權”，^[171]“裨益我華人”等特徵，^[172]都脫胎於先前的《香港近事編錄》，明顯受到《香港近事編錄》辦報風格的影響。同時，王韜後來強烈抨擊西方報紙和外人所辦

的一些華文報刊操持輿論，“揚外抑中”、^[173]“措詞命意未免徑庭”等弊病，^[174]多半也與王韜較長時間供職《香港近事編錄》報館、不斷觀察和深刻體認西人辦報的利弊得失有關。

由此可見，王韜擔任《香港近事編錄》主筆所積累的經驗，以及由此形成的辦報風格，乃至辦報思想上發生的重要變化，都對後來《循環日報》創辦有非同尋常的影響。

四、《循環日報》誕生之外圍因素

《循環日報》的成功創辦，除了文中已經論列的因素之外，其它的一些外圍因素也值得重視。

首先，《循環日報》誕生於《香港中外新報》、《香港近事編錄》和《香港華字日報》等華文報刊之後，這些報刊的競相問世，實際上為《循環日報》的創辦提供了可資借鑑的對象。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75]

歷史表明，無論是報刊本身的編輯事務，還是報刊創辦及其具體的管理經營模式，由《香港中外新報》以來所形成的一些傳統都對《循環日報》的創辦產生了積極影響。相對來說，正是由於香港華文報刊的辦報風格已經成型，《循環日報》的創辦才有現成路徑可循，並能在原有各華文報紙的基礎上適度創新。相反，如果缺少相應的借鑑對象，《循環日報》要取得後來的成就，恐怕會困難一些。這說明，《循環日報》與香港各華文報紙的淵源關係，確是《循環日報》創辦的一個重要先決條件，其中尤其受惠於《香港近事編錄》。《香港近事編錄》不僅培養了王韜這樣中國近代最早的職業報人，而且也孕育了作為近代民族報刊傑出代表的《循環日報》。因此，外人所辦華文報刊對《循環日報》創

辦所起的助推作用顯然不可小視。

其次,《循環日報》的創辦,也與1860年代以後,特別是1870年代初期香港社會出現的一些較明顯的變化有關。首先是香港華商實力的崛起。1860年代以後,香港的航運業、金融業、中轉貿易,都有較大發展,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更進一步推動了香港作為中轉貿易港地位的確立。受此驅動,香港華人經濟呈迅速增長態勢,經濟實力超邁從前。一部分經濟上日漸崛起的華商開始關注華人社會和自身利益的維護,致力於華人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在此關頭,他們迫切需要輿論的支持和聲援。《循環日報》的創辦正好適應了這一趨勢。從這個意義來說,如果早期的《香港船頭貨價紙》的問世標志著香港華商階層的初步形成,那麼《香港華字日報》和《循環日報》的創辦正是香港華商勢力崛起並開始走向強大的反映。這說明,《循環日報》的誕生確有其相應的社會經濟基礎。其次是1870年代後香港文化環境的逐漸改善和一部分華人知識精英的成長。“香港本南徼瀕海一荒島”,^[176]“向者為盜賊之萑苻,飛走之園圃”。^[177]但1870年代後,隨著香港華商實力的崛起和一部分華商樂善好施、散財興學,香港的文化環境也隨之發生改變。故“昔為棄土,今成雄鎮”,^[178]不僅“貨琛自遠畢集”,“操奇贏術者趨之若鶩”,^[179]而且“游觀之地,踵事增華,此外如博物院、藏書庫,亦皆次第建築”。^[180]王韜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記述這一變化說:

丁卯之冬余往游泰西,遍歷英、法諸國,及余掛帆東還,歲在庚午,頓覺港中氣象迥殊,人士多彬彬謹願,文字之社,扶輪風雅,宣講格言,化導愚蒙,率皆汲汲然引為己任。^[181]

1860—1870年代之交,推動香港文化環境改善的基本動力主要來自當時活躍於香港華人社會、並為其謀求權益的新興華商勢力以及一部分接受西方傳教士教育和培養的香港本地知識精

英。因此,王韜在贊佩香港文化環境漸趨改善的同時,也對這部分華商和知識精英“汲汲然引為己任”,致力香港文化事業發展的義舉表示由衷贊賞。值得注意的是,這批知識精英雖然多半出自香港聖保羅書院和香港大書院等教會學校,接受了一些近代的西學教育,但同時又具有一定的民族情感,眼界開闊,不滿現狀,渴望中國富強。因而,他們同樣是致力香港文化事業發展的生力軍和捍衛香港華人權益的力行者。《循環日報》的創辦,理所當然地受到他們的支持。

第三,從更大範圍看,《循環日報》的創辦,與1860年代後清廷啓動自強運動,“洋務”受到時人重視這一社會大背景有關。王韜生動地記述這種變化說:

咸豐初元,國家方諱言洋務,若於官場言及之,必以為其人非喪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雖有其說,而不敢質之於人。不謂不幾十年,而其局大變也,今則幾於人人皆知洋務矣。^[182]

說“人人皆知洋務”,或許有些誇張,但由此不難明白,推崇洋務,以兢尚洋務為高明,似乎已成為1870年代後朝野內外的一種風氣。香港既僻處邊陲一隅,又當中外南北交通之衝,交通便捷,信息發達,輿論空間相對廣闊。因此,中外時勢的變化首先能在這裏引發回響。事實上,從1860年代中後期開始,直到《循環日報》創辦,香港輿論界關注內地洋務自強運動的勢頭始終未減。1860年代末期《香港近事編錄》發起有關“中外強弱論”的討論和報紙徵文活動,1870年代初期《香港近事編錄》、《中外新聞七日報》和《香港華字日報》不時刊載有關呼籲洋務的“論說”,都是香港輿論界和內地洋務運動遙相呼應的重要體現。《循環日報》問世於1870年代,它當然不能不受到這一時代氛圍的影響。顯然,客觀環境的變化,洋務潮流的興起,實際上為《循環日報》創辦營造了必要的外部條件。

以上所論推動和導致《循環日報》創辦的幾種重要因素，實際上都是《循環日報》產生的一些外部間接因素或外部環境。雖然，相對於文中所論有關《循環日報》創辦的諸多內因來說，這些外因顯得次要一些。但是，仔細深究，導致《循環日報》創辦的這些諸多內因同樣離不開上述這些外因的影響和作用。王韜等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創辦《循環日報》，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正是他們較好把握這些外圍因素或外部環境，並對其積極加以利用的結果。

五、結 論

行文既竟，作三點結論。其一，《循環日報》的成功創辦，與作為重要創辦人之一的王韜在《循環日報》創辦前廣泛涉足香港諸多華文報刊關係甚巨。在這一過程中，王韜近代報刊輿論意識的形成，王韜與香港報界、商界和華人社會中的知識人士的廣泛交往所建立的良好關係，以及王韜在《香港近事編錄》報館長期歷練所積累的豐富的辦報經驗和鑄就的鮮明的辦報風格，都不同程度地為《循環日報》的成功創辦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動力、人事財政保障以及相應的業務基礎。這是日後促成《循環日報》成功創辦的最主要原因。其二，《循環日報》的成功創辦，亦有賴於香港特定的地理和人文環境以及香港較長時期以來華文報刊較為發達等諸多外圍因素的輔助。香港華商實力的崛起，文化環境的不斷改善、相對寬鬆和廣闊的輿論信息空間、香港華文報界對內地洋務自強運動的熱情關注，以及香港華文報刊所形成的日趨成熟的辦報模式，這都為《循環日報》成功創辦提供了適宜的社會土壤和相應的先決條件。然無論如何，相對於王韜的個人努力及其所起的關鍵作用，這些外圍因素仍是次要和輔助性的。其三，《循環日報》創辦緣起的多樣性體現出歷史問題背後的複雜性。只有對作為《循環日報》重要當事人王

韜的思想狀況及個人交往活動予以近距離的觀察和深入的實證研究,《循環日報》成功創辦的諸多重要、鮮活的內部直接因素,才能如實和較為清晰地展現出來。這也是研究《循環日報》的創辦緣起在方法論上得到的一點啓示。

(作者: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注釋:

- [1] 目前所知,以往真正涉及這一具體問題研究的只有臺灣的賴光臨先生。賴先生在1967年刊布的《王韜與〈循環日報〉》一文中指出:王氏創辦《循環日報》,除了早期與西方傳教士之交游、與歐美及香港報業之接觸外,其主要之因素,或有三端:一曰維生計,二曰求自見,三曰謀自強。見賴光臨:《王韜與〈循環日報〉》,《報學》,第3卷,第9期,第55頁。此外,夏良才在1992年發表的《王韜的近代輿論意識和〈循環日報〉的創辦》一文中也簡略涉及這一問題。夏文指出:“王韜爲什麼要創辦日報呢?這應該說與他亡命香港和游歷西歐各國的生活經歷有關。”見《歷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159頁。其他論著,大凡對這一問題,都未納入討論之列。譬如,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卓南生的《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增訂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毅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等,均是如此。
- [2] 種種迹象表明,賴光臨對《循環日報》的研究是在沒有看到《循環日報》的情況下完成的,因此,賴文所用材料以旁證居多,一些論斷也多係推測。
- [3] 1992年出版的《中國近代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也未專門討論《循環日報》創辦的起因,不過,該書在“鴉片戰爭後香港報業的興起”一節中,以總括性的手法敘述香港近代商業和外貿業的繁榮、英國占領香港後寓港華人人口的不斷增長、港英政府較為寬鬆的新聞管理制度等諸多表現,藉此說明近代香港華文報刊產生和發展的社會條件。這一研究路徑在借助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之光研究問題方面較有代表性,但是,由於它未能擺脫過多從“原則”

出發討論問題的窠臼，因此難免忽略了歷史問題的複雜性，不可避免地帶有一些粗枝大葉的痕迹。見方漢奇主編：《中國近代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85—288頁。

- [4] 《遐邇貫珍》影印文本，1854年第7號，8號。〔日〕松浦章、〔日〕內田慶市、沈國威：《〈遐邇貫珍〉的研究》，日本吹田：日本關西大學出版部，2004年，以下所引《遐邇貫珍》均據此版本。另，2005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又翻譯出版了該日文版影印本。見〔日〕松浦章、〔日〕內田慶市、沈國威：《遐邇貫珍》（附解題索引），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
- [5] 《瀛壖日志》為王韜咸豐三年三月十一日至咸豐四年正月初一日日記（1853年4月18日—1854年1月29日）。現藏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美國學者柯文在其《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一書中最早使用並錄有這部分日記。此處引自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雷頤、羅檢秋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頁。以下均據此版本。
- [6] 王韜：《瀛壖雜誌·甕牖餘談》卷3，陳戍國點校，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第78頁。以下均據此版本。
- [7] 《遐邇貫珍》影印本，1854年第7號，第635頁。
- [8] 陳正青整理：《王韜未刊日記、雜錄》，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第十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8頁。《王韜日記》咸豐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也有對應雨耕的介紹：“雨耕名龍田，祖籍浙江蘭溪人，固武世家。其父調選至京，遂家焉。後為廣東副將，又徙於粵。為人慷慨，以膽略自負，待友誠至悱惻，意氣激昂，亦奇男子也。”見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6頁。以下均據此版本。
- [9] 關於《遐邇貫珍》的研究，目前所知的最早研究成果當推新加坡學者卓南生1974年在日本立教大學《應用社會學研究》刊布的《〈遐邇貫珍〉（1853—1856）——對香港最早的中文月刊報紙的探討》一文，該文後收入卓氏《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增訂版，第5章。
- [10] 《遐邇貫珍》為月刊，自1853年8月創刊至1866年5月停刊，實際月數為34月，故應出34冊，但由於1854年3月停1期，當年4月所出該刊合第3、4期為1期，故該刊共出版33冊。
- [11] 黃勝擔任倫敦傳道會印刷所主管一事，見蘇精：《黃寬與黃勝：容閩的兩名

同學》,《傳記文學》(臺北),第46卷,第2期,第73頁。黃勝主持《遐邇貫珍》實際事務一說,見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5頁。該著指出:“舉凡中文撰稿、英文翻譯、報館總務,均由黃勝經理。”確切出處待考。

- [12]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第16頁。
- [13] 《遐邇貫珍》影印本,1854年第7號,第635頁。
- [14]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第15頁。
- [15]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十年三月二十四日,第157頁。
- [16] 《遐邇貫珍》影印本,1854年第7號,第635頁。
- [17] 王韜:《弢園老民自傳》,《弢園文錄外編》卷11,上海:上海書店,2002年,第269頁。
- [18] 《遐邇貫珍》影印本,1854年第7號,第635頁。
- [19] 王韜:《弢園尺牘》卷2,《與孫揚庵茂才》,清光緒二年香港天南遐窟鉛印本,第20頁。以下所引《弢園尺牘》1—8卷,均據此版本。
- [20]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1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頁。
- [21]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第1冊(手稿影印本),臺北:臺北學生書局,1964年,第105頁。
- [22] 羅郎也為澳門土生葡萄牙人,西文名 Delfino Joaquim Noronha,1924年生於澳門大堂區,1900年2月6日在香港離世。他是羅郎也家族第四代澳門土生人。羅郎也是其西文名的粵語譯法。羅郎也早年由澳門遷往香港,是開埠初期香港報界和印刷界的代表人物之一。除開辦《香港近事編錄》外,還開設羅郎也印字館,羅郎也印字館不僅出版印刷葡文和中文報刊,而且承印西文報刊。香港開埠後的第一批英文報紙幾乎全部由該印字館承印出版,有關羅郎也基本情況的敘述,見李長森《近代澳門外報史稿》,第5頁、第178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23] 關於《香港近事編錄》的刊期、編務等具體情況,蕭永宏《〈香港近事編錄〉史事探微——兼及王韜早期的報業活動》一文有詳細考證。見《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83—184頁。
- [24] 關於《香港近事編錄》的停刊時間,此處採用了美國傳教士范約翰(J. M. W. Farnham)1890年所提供的《中文報刊目錄》中的說法。范約翰的《中文報刊目錄》,見周振鶴《新聞史上未被發現與利用的一份重要資料》一文之附錄。

《復旦學報》1992年第1期,第68—70頁。

- [25] 但據王韜《論日報漸行於中土》提供的線索,該報創刊似應在1865年2月問世於廣州的《中外新聞七日錄》之後。另據目前所見,《中外新聞七日錄》最早轉載《香港近事編錄》的文章,時在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六日(1867年12月21日)。
- [26] 《循環日報與華字日報論辯》,《益報》,光緒元年九月初六日。
- [27] 有關“香港日報”為《香港近事編錄》的考證詳見蕭永宏《〈香港近事編錄〉史事探微——兼及王韜早期的報業活動》一文,《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79—180頁。
- [28] 王韜:《悔餘隨筆》,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第218—219頁。
- [29] 美籍學者白瑞華所著《中國報刊》一書曾提到,王韜在協助理雅各譯書的同時,還擔任《香港近事編錄》的編輯工作。此不知何據?但聯繫上述事實,可知白瑞華所論,實事出有因,當非虛語。白瑞華的說法見 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33, p. 43.
- [30] 王韜在《答〈強弱論〉》一文中提到:“前者《香港日報》中嘗論國家盛衰強弱之故,倚伏無端,而其能明致弱之由,振積衰之勢,探自強之道,立常盛之地者,則未有之也……日報秉筆之人嘗以是篇附於郵筒,遠致之七萬里之外,來問於甫里逸民。逸民讀未終篇,作而嘆曰:‘憂深哉,其人也!此恤緯之嫠,倚柱之女,所以致無可如何之思也。’因聊據所見以答之。”經考證,此“香港日報”,即為《香港近事編錄》。王韜《答〈強弱論〉》一文,見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7,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166頁。以下均據此版本。有關“香港日報”為《香港近事編錄》的考證,見蕭永宏《〈香港近事編錄〉史事探微——兼及王韜早期的報業活動》,《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以下有關王韜與《香港近事編錄》的具體關係的敘述均見該文,不贅。
- [31] 《本館自述》,《申報》,壬申年四月初二日。
- [32] 《本館自敘》,《申報》,壬申年四月十四日。
- [33] 如《侯失勒傳》、《接續侯失勒傳》兩文後收入《甕牖餘談》卷3,《論今時勢》後收入《弢園文錄》卷2,收入時前者標題為“侯失勒傳”,後者標題為“中外合力拒俄論”。《侯失勒傳》和《接續侯失勒傳》分別為壬申年八月廿二日、八月廿六日《申報》轉載,《論今時勢》原刊壬申年二月十七日《香港近事編

錄》，同年四月初五日《上海新報》轉載。

- [34] 《香港船頭貨價紙》的實際創刊時間，尚有待進一步考證。卓南生的說法是1857年11月3日，筆者對此存疑。故此處只提1850年代後期。卓南生有關該問題的論證見卓著：《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增訂版，第110頁。
- [35] 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增訂版，第115頁。
- [36] 從1873年開始，香港藍皮書對該報出版日期的記載已明確注明“Daily”。見Return of the Principal Publications in 1873, *Hong Kong Blue Book*, Printed By Noronha & Sons Government Printers.
- [37] 《選錄香港新報》，《上海新報》，己巳年十二月十九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59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以下所引《上海新報》均據此版本。
- [38] 《申報》，癸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39] 不過，不少材料提到與王韜私交很好的黃勝曾創辦《香港中外新報》，並擔任過該報的主筆。因此，王韜在該報刊文疑與黃勝有關。黃勝，一名達權，字平甫，廣東香山縣東岸鄉人，1825年生於澳門，1840年入馬禮遜紀念學校就讀。1842年隨該校前往香港。1847年赴美馬薩諸塞州孟松學校留學，第二年秋因病返港。先到德臣西報（即The China Mail）學習印刷，後改任倫敦傳教會所辦的教會印刷所主管，協助理雅各出版英譯《四書》。1860年，與孖刺西報合作刊行《香港中外新報》。王韜1862年避禍香港僅10天，黃勝即親來探望。當年，王韜還與黃勝合作譯著成《火器說略》一書，上達李鴻章、丁日昌等清廷要員。1864年秋，黃勝應丁日昌之邀北上，擔任上海廣方言館教習，1867年以孝養告退，不久返港。1869年又應丁日昌邀赴滬，但在滬僅留兩月即返。此後，直到1873年夏帶領第二批30名幼童赴美之前，黃勝一直寓居香港。黃勝在港期間，是否還擔任《香港中外新報》主編？王韜刊於《香港中外新報》的“致友人書”是否也與黃勝有關？現缺乏確切史料。但從王韜和黃勝交往密切，黃勝又是《香港中外新報》的重要創辦者等事實來看，這種可能理應存在。
- [40] 該報初附刊於《德臣報》第三版，自辛未年六月廿六日（1871年8月12）起移至第七版。除創刊號未出滿一版外，其後的56期均為一整版。
- [41] 陳善言，又名陳言。廣東新會人，字慎於，號霽廷、霽亭，1856年到香港，香港

聖保羅書院畢業。後在港府巡禮府充書吏,1871年3月受德臣報館聘,司理該報翻譯并英文日報副主筆,同時在《德臣報》設《中外新聞七日報》專版,1872年4月《香港華字日報》創刊後,任該報主筆。

- [42] 王韜不僅對陳善言的西學知識表示贊佩,稱其“西學之長,近時允推巨擘”。而且私下還向丁日昌舉薦之,希望能為朝廷所用。見王韜:《上豐順丁中丞》,《弢園尺牘》卷9,清光緒十三年大文書局鉛印本。
- [43] 王韜:《普法戰紀·凡例》,清同治十二年香港中華印務總局鉛印本。
- [44] 因王韜這段話撰於《香港華字日報》問世以後,因此,王韜實把《中外新聞七日報》和《香港華字日報》看作同一份報紙。據王韜自述,《普法戰紀》“載筆於庚午八月,而斷手於辛未六月”,但是,截至辛未六月下旬,“時僅以十二卷為斷手”。見王韜:《普法戰紀·凡例》,清同治十二年香港中華印務總局鉛印本。
- [45] 王韜:《普法戰紀·凡例》,清同治十二年香港中華印務總局鉛印本。
- [46] 《聯邦名人錄》,《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五月二十一日(July 8, 1871, The China Mail)香港大學圖書館藏,以下均據此版本。
- [47] 《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四月二十三日(June 10, 1871. The China Mail)。《開煤礦論》後被收入王韜《甕牖餘談》卷3,標題改為“煤礦論”。內容同。
- [48] 《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四月三十日(June 17, 1871. The China Mail)。據筆者考認,從該文筆法、觀點來看,出自王韜的可能性很大。
- [49] 《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七月初四日(August 19, 1871. The China Mail),壬申年二月二十九日(April 6, 1872. The China Mail)。
- [50] 據王韜自述,截至辛未(1871年)六月下旬,《普法戰紀》只完成了前十二卷,而第十三、十四兩卷“乃近時續成”,且“悉從陳君日報采出”。王韜說這番話時已是《普法戰紀》十四卷本定稿付梓前夕,時當1872年9月左右,而此時《香港華字日報》問世已近乎半年之久。因此,王韜所言“陳君日報”必是《香港華字日報》無疑。見王韜:《普法戰紀·凡例》,清同治十二年香港中華印務總局鉛印本。
- [51] 王韜:《普法戰紀·凡例》,清同治十二年香港中華印務總局鉛印本。
- [52] 《申報》於癸酉年六月初十日、六月十五日、六月三十日分三次轉載同年六月初一日《香港華字日報》刊載的《瀛壖雜識》。
- [53] 據筆者整理成的《申報》轉載香港華文報刊文章目錄統計而成。另外,日本

學者西裏喜行《關於王韜和〈循環日報〉》一文所輯錄的《〈循環日報〉論文目錄一覽》對此也有說明。見鄭海麟譯，西裏喜行著：《關於王韜和〈循環日報〉》，《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0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282—283頁。

- [54] 5篇文章分別是：《送理牧師回國序》、《法國儒蓮小傳》、《琉球朝貢考》、《玉筍生論生死書》、《英國日報之盛行》，其中前三篇後收於《弢園文錄外編》，《玉筍生論生死書》後收入《弢園尺牘》卷九，標題改為“與友人”。《英國日報之盛行》後重刊於《循環日報》，標題改為“紀西國日報之盛”。上述文章具體發表或轉載時間，筆者在《〈弢園文錄外編〉篇目來源考辨——〈弢園文錄外編〉和〈循環日報〉關係之研究》一文中有詳細說明，此從略。見前揭文，《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第4期（2006年）。
- [55] 如《申報》轉載《玉筍生論生死書》一文後，不久又刊出“論說”“書玉筍生生死論後”，對王韜原文的觀點展開評論。見《申報》，癸酉年十二月二十日。
- [56] 王韜：《弢園尺牘》卷2，《與孫協庵茂才》，清光緒二年香港天南邇窟鉛印本，第20頁。
- [57] 王韜：《弢園尺牘》卷3，《與周弢甫比部》，第16頁。另，該信函全文王韜又錄入其《日記》，見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八年十二月九日，第61頁。
- [58] 偉烈亞力云：“泰西之政，下悅而上行，不敢以一人攬其權，而乾綱仍弗替焉。商足而國富，先欲與萬民用其利，而財用無不裕焉。故有事則歸議院，而無蒙蔽之虞；不足則籌國債，而無捐輸之弊。”見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九年四月四日，第113頁。
- [59]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九年四月四日，第113頁。以此類推，王韜還以同樣的思路和相應的理由對建鐵路、用機器、開議院等西方“善政”逐一加以否定。
- [60]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九年四月七日，第114頁。
- [61] 偉烈亞力：《六合叢談小引》，《六合叢談》第1號，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增訂版收有《六合叢談小引》影印本全文，見卓著《附錄Ⅱ》，第229頁。因為“小引”中“蒼穹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遙，如同衽席”，類似的話，王韜筆下經常出現，加之當時王韜擔任協助傳教士從事漢文翻譯刪削的角色，因此，不排除此“小引”曾經王韜潤色修改過。

- [62] 據現存上海圖書館古籍部王韜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蘅華館日記》所記內容，該信函并未寫成。文中後半部分空出 17 行。王韜《日記》云：“燈下偶檢敝篋，得致周弢甫騰虎第一書稿，備論中外民俗異宜，以未成，不果寄。雨夜無聊，特加刪改，錄出之。”見《蘅華館日記》，不分卷，稿本，上海圖書館古籍部藏。以下均據此版本。推斷此信作於 1857 年的依據是，王韜信中寫道：“睽曠三年，邂逅一旦，寓齋清話，移晷忘倦。”因周騰虎 1855 年秋曾携山東曲阜人孔宥涵來滬，王韜與之“傾襟談藝，捉麈論兵”，由此知，該信函撰於 1857 年。周騰虎 1855 年秋來滬事，見張志春：《王韜年譜》，第 31 頁。另，該《年譜》將此信函的撰著時間斷定為 1859 年，似不妥，應改之。見張志春：《王韜年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43 頁。以下均據此版本。
- [63]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第 81 頁。
- [64]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第 83 頁。
- [65] 王韜：《弢園尺牘》卷 4，《與周弢甫徵君》，第 14 頁。此處所引，即王韜 1859 年以後所補寫，原《日記》並無此內容。
- [66]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第 84 頁。
- [67]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第 83 頁。
- [68]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第 82 頁。
- [69] 該文收入《弢園文錄》卷 3，標題為“與周弢甫徵君論西務書”，收入《弢園尺牘》時標題為《與周弢甫徵君》。內容均與《日記》不同，後半部分為後來補寫而成。前已論及，此不贅。
- [70] 王韜：《弢園尺牘》卷 4，《與周弢甫徵君》，第 10 頁。
- [71] 如 1872 年由王韜命筆而以陳瑞南名義刊布的《普法戰紀》序言中即云：“王君向固富有志於富強之術矣！其論以為莫如師其所長。持此說約二十餘年而不變。觀其《弢園文錄》中《與周弢甫徵君書》，言及練兵、製艦、造槍炮、肄習語言文字，今當事者皆一一行之。”其後撰成的《瀛壖雜誌》中又說，馮桂芬“嘗見餘致周弢甫書，極為嘆賞，以為近來談西務者，當以此為左券”。甚至 1875 年所撰的《洋務下》一文中，還強調：“十六七年前，竊嘗欲中國仿行西法，其言曰：‘以其所長，奪其所恃。故火器用於戰陣，舟艦用於江海，語言文字用於通彼此之情。’”此後，直到 1878 年王韜在其《洋務論上》一文中還一再提及該文及其文中的一些觀點。如說：“此皆余二十七八年前所言也，時

在咸豐初元，國家方諱言洋務，若於官場言及之，必以為其人非喪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雖有其說，而不敢質之於人。不謂不及十年，而其局大變……此我在二十七八年前，所未及料者也。”以上引文分別見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8，第197頁；王韜：《瀛壖雜誌》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2—83頁。以下均據此版本。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4，第27頁；第26頁。

- [72] 王韜：《蘅華館日記》，不分卷，稿本，上海圖書館古籍部藏。
- [73] 王韜：《蘅華館日記》，不分卷，稿本。
- [74] 王韜：《弢園文錄》卷3，稿本，南京圖書館古籍部藏。以下所引《弢園文錄》均據此稿本。
- [75] 查考王韜日記得知，也就在王韜於其日記中錄入《與周弢甫徵君》三個月之後，才發生了王韜和蔣敦復與偉烈亞力之間的那場關於中西政俗優劣得宜的討論。由此可知，由於此前王韜對有關中西關係問題，尤其是在價值層面對西學與中學的相互關係的思考已經相當充分，因此，當他與偉烈亞力討論有關問題時才能雄辯滔滔，游刃有餘，並對偉烈亞力所倡導的多項“善政”予以巧妙回絕。比勘《與周弢甫徵君》中基本內容和《日記》所記王韜在討論中的言辭，可證王韜討論中所發表的基本觀點，幾乎完全出自《與周弢甫徵君》，甚至前者幾乎就是後者的縮寫版。這也說明，王韜當時在討論中所持的反西學立場正是以《與周弢甫徵君》一文為思想基礎的。當然，王韜對西學的排拒畢竟有不同於當時一般中國士人的一面，因為直到1862年王韜避禍香港以前，他已在西方傳教士主持的墨海書館供職整整13年，因此，王韜在思想上對西學進行部分的吸納也合乎情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王韜在《與周弢甫徵君》中補寫進仿行西法三條有一定的思想基礎。但是，王韜積累這些有限的西學知識畢竟還未給予他有足夠的力量逸出中國傳統名教的軌道。就思想水平而言，王韜提出的仿行西法三條充其量也只盤桓在林則徐、魏源當年“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層面上，基本接近於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中“采西學”、“製洋器”的主張，還缺乏更新鮮的思想因素。
- [76] 因為大到立言點、基本理路，小到具體文字，兩篇文章均多有雷同。具體比勘過程此從略。
- [77] 這些論述主要包括：“我中國先文教而後武功，重德性而輕詐力”，“能以至柔克至剛，至弱克至強”，“奈何欲以暫來之西人易數千年之中國”等，見王韜：《代上蘇撫李宮保書》，《弢園尺牘》卷7，第10頁。

- [78] 王韜：《代上蘇撫李宮保書》，《弢園尺牘》卷7，第10頁。
- [79] 即“一曰火器用於戰”；“二曰輪船用於海，以備寇盜，戒不虞”；“三曰語言文字以通彼此之情”。見王韜：《與周弢甫徵君》，《弢園尺牘》卷4，第10頁。
- [80] 王韜：《代上蘇撫李宮保書》，《弢園尺牘》卷7，第10頁。
- [81] 王韜：《與周弢甫徵君》，《弢園尺牘》卷4，第5頁。
- [82] 分別見：王韜：《與周弢甫徵君》，《弢園尺牘》卷4，第5頁；《代上蘇撫李宮保書》，《弢園尺牘》卷7，第2頁。
- [83] 王韜：《與周弢甫徵君》，《弢園尺牘》卷4，第5頁。
- [84] 王韜：《代上蘇撫李宮保書》，《弢園尺牘》卷7，第3頁。
- [85] 王韜：《代上蘇撫李宮保書》，《弢園尺牘》卷7，第3頁。
- [86] 王韜：《代上蘇撫李宮保書》，《弢園尺牘》卷7，第4頁。
- [87] 王韜：《與周弢甫徵君》，《弢園尺牘》卷4，第11—12頁。
- [88] 王韜：《弢園文錄》卷8，稿本。
- [89] 王韜：《漫游隨錄》卷3，陳尚凡、任光亮校點，《漫游隨錄·扶桑游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9—140頁。以下均據此版本。
- [90] 王韜：《代上蘇撫李宮保書》，《弢園尺牘》卷7，第3頁。
- [91] 王韜：《代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8，第6—7頁。
- [92] 王韜：《代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8，第7頁。
- [93] 王韜：《代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8，第7頁。
- [94] 王韜：《代上丁觀察書》，《弢園尺牘》卷7，第17頁。
- [95] 王韜：《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8，第11頁。
- [96] 王韜：《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8，第11頁。
- [97] 王韜：《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8，第12頁。
- [98] 王韜：《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8，第12頁。
- [99] 王韜：《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8，第12頁。
- [100] 該文原刊《香港華字日報》，具體發表時間約在壬申年十二月至癸酉年正月之間，後為《申報》轉載，見《申報》，《英國新報之盛行》，癸酉年正月二十一日。以下只注《申報》刊載時間。
- [101] 王韜：《英國新報之盛行》，《申報》，癸酉年正月二十一日。
- [102] 王韜：《英國新報之盛行》，《申報》，癸酉年正月二十一日。
- [103] 王韜：《英國新報之盛行》，《申報》，癸酉年正月二十一日。

- [104] 王韜:《英國新報之盛行》,《申報》,癸酉年正月二十一日。
- [105]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九年四月四日,第113頁。
- [106] 這些文章發表時都未署名,但經筆者考證,均為王韜所作。其中,《西國日報之盛》一文最早刊於《香港華字日報》,標題為“英國新報之盛行”,此為重刊,內容同。
- [107] 王韜:《本館日報略論》,《循環日報》冊裝周刊本,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香港大學圖書館藏,以下所用同治十二年、十三年《循環日報》,均據香港大學所藏《循環日報》縮微膠卷。有關《循環日報》冊裝周刊本的具體情況,另有專門論述。此不贅。
- [108] 王韜:《本局日報通啓》,《循環日報》冊裝周刊本,第23頁。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109] 王韜:《日報有裨時政論》,《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 [110] 王韜:《日報有裨時政論》,《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 [111] 王韜:《日報有裨時政論》,《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 [112] 王韜:《本局日報通啓》,《循環日報》冊裝周刊本,第23頁。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113] 王韜:《日報有裨時政論》,《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 [114] 王韜:《上潘偉如中丞》,《弢園尺牘續鈔》卷2,清光緒十五年鉛印本。
- [115] 王韜:《擬上合肥相國》,《弢園尺牘》卷12,清光緒十三年大文書局鉛印本。
- [116] 有關黃勝早期的經歷,臺灣學者蘇精:《黃寬與黃勝:容閩的兩名同學》一文有較詳細敘述,該文見《傳記文學》(臺北),第46卷,第2期,第73頁。
- [117] 王韜:《〈火器說略〉前序》,《弢園文錄外編》卷8,第186頁。
- [118]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一日,第196頁。
- [119] 有關黃勝早期的這些經歷,均據前揭蘇精文,見蘇精:《黃寬與黃勝:容閩的兩名同學》,《傳記文學》(臺北),第46卷,第2期,第73頁。
- [120] 王韜:《弢園老民自傳》,《弢園文錄外編》卷11,第271頁。
- [121] 王韜:《弢園尺牘》和《弢園尺牘續鈔》兩書共收入王韜上丁日昌書10封,其中包括《弢園尺牘》卷7的《代上丁觀察書》(2封,標題同)、《弢園尺牘》卷8的《代上丁中丞書》、《上丁中丞書》(2封,標題同)、《弢園尺牘》卷9的《上豐順丁中丞》、《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10的《代上丁大中丞》、《弢園尺牘》卷11的《上丁大中丞》、《弢園尺牘續鈔》的《上豐順丁中丞

師》，《循環日報》創辦以前的5封信函主要指上述《弢園尺牘》第7、8兩卷所收之信函。

- [122] 即《弢園尺牘》卷7的《代上丁觀察書》2封和《弢園尺牘》卷8的《代上丁中丞書》1封。
- [123] 蘇精：《黃寬與黃勝：容閩的兩名同學》，《傳記文學》（臺北），第46卷，第2期。第73頁。
- [124] 據《香港華字日報》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所刊“中華印務總局告白”，其中提到：“又擬於此後倡行日報，每日刊發。”林友蘭：《一份百年前的華字日報》收有該告白。見林友蘭：《香港報業發展史》，臺北：世界書局，1977年，第84頁。以下均據此版本。
- [125] 《循環日報》創辦初期所刊“中華印務總局”告白稱“總司理”為陳霽廷，但從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起，告白又稱黃平甫（即黃勝）為“正總司理”。見《中華印務總局告白》，《循環日報》，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 [126] 香港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籌辦於1843年12月22日，籌辦人為英國聖公會牧師史丹頓（V. J. Stanton），1851年正式招生，1867年因資金缺乏停辦。後於1919年重建，延續至今。陳善言肄業香港聖保羅書院事，見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增訂版，第161頁。張宗良肄業聖保羅書院事，見王韜：《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9，大文書局光緒十三年鉛印本。有關聖保羅書院簡史的介紹，見餘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302頁。以下均據此版本。
- [127] 香港德臣報館辛未年正月十三日所刊告白稱：“霽廷陳言先生前在巡禮府充當書吏之職，今本館延請司理翻譯事務，并英文日報副主筆……”見《告白》，《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二月初五日。
- [128] 1872年6月，港英政府公開招考華民政務司書吏，張宗良和胡禮垣考中，分別名列12位應試者中之第一、第二名。此後，張宗良離任《香港近事編錄》“主筆”，供職於港府華民政務司。壬申年五月廿一日《香港近事編錄》曾以“英官考選書吏”為題對此事做了報道，該文後為《上海新報》轉載。見《英官考選書吏》，《上海新報》壬申年七月初二日。
- [129] 王韜：《上豐順丁中丞》，《弢園尺牘》卷9，清光緒十三年大文書局鉛印本。同時，不排除1860—1870年代之交在《香港近事編錄》發起有關“中外強弱論”討論的主筆即是張宗良本人。

- [130] 《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三月十七日(May 6, 1871. The China Mail)。
- [131] 《本館告白》，《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二月初五日(March 25, 1871. The China Mail)。
- [132] 《本館告白》，《中外新聞七日報》，壬申年二月二十二日(March 30, 1872. The China Mail)。
- [133] 《創設香港華字日報說略》，《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五月廿一日(July 8, 1871. The China Mail)。
- [134] 《本館告白》，《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二月初五日(March 25, 1871. The China Mail)。
- [135] 張宗良、陳善言協助王韜譯撰《普法戰紀》一事，王韜在《普法戰紀·凡例》中有詳細交待。
- [136] 《循環日報》創辦初期所刊“中華印務總局”告白稱王紫詮(即王韜)為“正主筆”，見《中華印務總局告白》，《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 [137] “總司厥事”是王韜自己的說法，王韜在其自傳中說：“癸酉，香海諸同人釀資設印局，創行日報，延老民總司厥事。”見王韜：《弢園老民自傳》，《弢園文錄外編》卷11，第271頁。
- [138] 以上所引王韜向丁日昌推薦陳善言、張宗良、伍廷芳三人及對三人的評價俱見王韜：《上豐順丁中丞》，《弢園尺牘》卷9，清光緒十三年大文書局鉛印本。
- [139] 譚乾初：《古巴雜記》對此有記載。見譚乾初：《古巴雜記》，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2帙，清光緒十七年鉛印本。以下均據此版本。
- [140] 張宗良任駐日使館隨員的有關情況，王寶平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摺》有詳細輯錄，見王寶平：《清末駐日外交使節名錄》，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編：《中日關係史論考》，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242、243頁。以下均據此版本。另，光緒五年(1879)王韜訪日期間，與張宗良再次相會，王韜《扶桑游記》中有多處記載，此不贅。
- [141] 《中華印務總局告白》，《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 [142] 《香港中外新報》刊有《銅帽論》一文，分兩次登出。首次登出者為馮普熙的求教信，信後署“中外新報館主筆清照，明珊氏謹識”。第二次刊出者為“論銅帽造法”。其中，馮普熙的求教函後被《上海新報》轉載。見《銅帽論》，《上海新報》，庚午年九月二十四日。

- [143] 《西國急粉造法》，原刊《香港中外新報》，後為《上海新報》轉載。見《上海新報》，庚午年九月二十六日。
- [144] 《答中外強弱論》，原刊壬申年二月初七日《香港近事編錄》，後為《上海新報》轉載。見《上海新報》，壬申年三月拾捌日。
- [145] 王韜：《解惑論》，《弢園文錄》卷8，稿本。
- [146] 梁鄂：《徵刻王紫詮先生〈普法戰紀〉後》，《申報》，壬申年八月初八日。該文原刊壬申年《香港近事編錄》，後為《申報》轉載。梁鄂，字智芸、志芸等，係王韜好友。
- [147] 據王韜：《徵設香海藏書樓序》，馮普熙、伍廷芳等發起徵設“香海藏書樓”活動的時間應在1869—1872年間，因文中提到：“同治己巳特立東華醫院，百廢俱舉……”知其時東華醫院尚未建成（東華醫院的落成時間在1872年2月14日）。
- [148] 此處馮指馮普熙、伍指伍廷芳。引文見王韜：《徵設香海藏書樓序》，《弢園文錄外編》卷8，第184頁。
- [149] 《中華印務總局告白》，《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該告白稱：“局中以梁鶴巢、馮普熙、陳瑞南為值理。”
- [150] 《新建醫館》，原刊《香港近事編錄》，《上海新報》轉載，見《上海新報》，庚午年五月二十日。
- [151] 該序係王韜自撰，以陳桂士名義署名，後收入《弢園文錄外編》，見王韜：《〈普法戰紀〉代序》，《弢園文錄外編》卷8。
- [152] 目前所見，《香港近事編錄》至少三次對香港東華醫院的情況作過報道，三次報道的標題分別為：《新建醫館》、《東華醫院對聯》和《公舉董事》。
- [153] 王韜：《創建東華醫院序》，《弢園文錄外編》卷8，第199頁。
- [154] 王韜：《東華醫院對聯》，原刊壬申年正月初六日《香港近事編錄》，見《上海新報》，壬申年二月二十日。
- [155] 《香港華字日報》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所刊《中華印務總局告白》，見林友蘭：《香港報業發展史》，臺北：世界書局，1977年，第84頁。
- [156] 王韜：《販人出洋輯錄跋》，《弢園文錄》卷2。
- [157] 《香港紳士見總稅務司》，原刊壬申年四月初八日《香港中外新報》，見《上海新報》，壬申年四月二十九日。
- [158] 如庚午年所刊一則“頌詞”中就有陳瑞南、梁鶴巢、李阡、唐茂枝等多名華

商。見《上海新報》，庚午年七月二十四日。

- [159] 保良局百年史略編輯小組委員會主編：《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轉引自餘繩武、劉存寬：《十九世紀的香港》，第412頁。
- [160] 有關馮普熙和香港保良局的活動，見餘繩武、劉存寬：《十九世紀的香港》，第414頁。
- [161] 這是筆者的推斷。依據是，筆者仔細查勘現存《中外新聞七日報》的內容，發現該報後期刊發的稿件，有不少為王韜所撰。因此，王韜擔任該報編務的可能較大。至於隨後的《香港華字日報》，也刊發過少量王韜所撰文章，而且，1890年美國傳教士范約翰提供的《中文報刊目錄》在“華字日報”“主編”欄，明確提到“陳藹亭與王韜”兩人。在無確切史料證實王韜擔任過《香港華字日報》編務的情況下，上述史實顯然值得重視。范約翰的《中文報刊目錄》，見周振鶴《新聞史上未被發現與利用的一份重要資料》之附錄。《復旦學報》1992年第1期，第69頁。
- [162] 據新加坡學者卓南生研究，近代中文報紙最早的“論說”當推1859年3月底至4月之間《香港船頭貨價紙》刊登的《豬仔論》一文。見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4—1875)》增訂版，第143頁。
- [163] 如以數目論，嚴格意義的論說文章，《香港中外新報》共有18篇，約占其現有文章總量148篇的12%，而《香港近事編錄》共有論說文章32篇，約占其現有文章總數165篇的20%。以內容言，《香港近事編錄》所刊32篇論說幾乎全為有關國計民生和國際時事的時論文章，其中不少篇目議論深刻，見解超群，實為近代報刊論說中的上乘之作。而《香港中外新報》的18篇論說中却多為像《理欲辨》、《七巧論》、《三友小傳》、《名醫論病》等一般性的論說，除極個別篇目外，很少有像《香港近事編錄》那樣的議論風生之作。有關情況，筆者另有研究，此不贅。
- [164] 王韜：《論今時勢》，原刊《香港近事編錄》，壬申年二月十七日，見《上海新報》壬申年四月初五日。文中，王韜明確號召“英法強中以禦俄”，力保歐亞形勢“相安於無事”，“然後我中國勵精圖治，發奮為雄，足以有恃而無恐”。
- [165] 《選錄香港新報》，《上海新報》，己巳年十一月初七日。
- [166] 《香港中外新報》的前身《香港船頭貨價紙》即是如此。該報在香港殖民地問題、英法出兵等直接關係英國人利益的問題上即完全替英國人說話。有關《香港船頭貨價紙》的殖民主義立場的研究，見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

展史(1815—1874)》增訂版,第147頁。

- [167] 《不可不辨》,原刊《香港近事編錄》,壬申十月廿五日,見《上海新報》壬申年十一月廿四日。
- [168] 《龍論》,原刊《香港近事編錄》,辛未年九月初五日,見《上海新報》辛未年十月十六日。
- [169] 如《香港近事編錄》至少曾兩次刊載對瑞麟用人方略和治粵政績高度贊譽的文章。其中《用人得當》一文言其“政績昭然,具在人口”,“兩粵庶黎,蓋有隱受其惠,身被其德至於浹髓滲肌而猶不自知者”。《瑞相仍留督粵省》則稱“其為兼圻大臣則澤被於封疆,其為樞廷襄贊則惠流於天下”。《用人得當》,見《上海新報》,壬申年九月初十日;《瑞相仍留督粵省》,見《上海新報》,壬申年十月廿二日。
- [170] 《浮言必辨》,原刊《香港近事編錄》,辛未年二月初二日。見《上海新報》辛未年二月二十二日。該文認為輿論“以此咎曾公,誠為未知曾公者也”。贊揚曾國藩為“一代偉人”,“天下之民莫不想望風采,倚之如金城湯池,仰之如泰山北斗”。
- [171] 《本局布告》,《循環日報》冊裝周刊本,第24頁。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172] 王韜:《本局日報通啓》,《循環日報》冊裝周刊本,第23頁。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173] 王韜《與方照軒軍門》云:“邇來西人在中土通商口岸創設日報館……其所言論,往往抑中而揚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顛倒。”見《弢園尺牘續鈔》卷4,清光緒十五年鉛印本。
- [174] 《倡設日報小引》,《循環日報》冊裝周刊本,第22頁。未署時間。
- [175]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頁。
- [176] 王韜:《香港略論》,《弢園文錄外編》卷6,第147頁。
- [177] 王韜:《創建東華醫院序》,《弢園文錄外編》卷8,第198頁。
- [178] 王韜:《徵設香海藏書樓序》,《弢園文錄外編》卷8,第183頁。
- [179] 王韜:《徵設香海藏書樓序》,《弢園文錄外編》卷8,第183頁。
- [180] 王韜:《徵設香海藏書樓序》,《弢園文錄外編》卷8,第182頁。
- [181] 王韜:《創建東華醫院序》,《弢園文錄外編》卷8,第199頁。
- [182] 王韜:《洋務上》,《弢園文錄外編》卷2,第26頁。

Wang Tao and the Early Modern Chinese Newspaper Industry of Hong Kong — On the Origins of the *Hsun Huan Jih Pao*

Xiao Yongho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uccessful establishment of the *Xunhuan ribao*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Hong Kong's Chinese press of Wang Ta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unders of the newspaper. Wang Tao provided the essential intellectual motive, financial security, and entrepreneurial basis of the paper in its early stage. For Wang Tao had an awareness of the role of the early modern press, extensive contacts with important figures throughout journalistic and business circles, and also abundant experience working for *Jinshi bianlu* (Contemporary Affairs). These were the primary reasons that the *Xunhuan ribao* could be founded successfully.

Keywords: Wang Tao, 〈Hsun Huan Jih Pao〉, 〈Chin-shih Pien-lu〉, 〈Precious News〉, 〈Chinese and Foreign Newspaper〉, 〈Wah Tze Yah Pao〉, Chen Shanyan, Zhang Zongliang, Feng Puxi, Liang An, Chen Guishi